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1.001

# 毛泽东政治话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的修辞学阐释

刘先锐,王习胜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要关注“谁在说”“说什么”“对谁说”的问题,更要关注“怎么说”的问题。“要人家服,就要说服”,说服的策略与方法离不开修辞理论的指导。毛泽东政治话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有深刻的修辞意蕴,对这一话语进行修辞学分析与阐释有助于我们准确揭示、深刻理解、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规律,进而构建受众注意听、听得进、有好感的话语体系,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说服力、感染力和传播力。

**关键词:**毛泽东;政治话语;思想政治教育;修辞;辞格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1-0001-07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诉诸情感、诉诸说理、诉诸人格的过程,也是通过有效使用言辞以塑造或者改变受教育者思想观念、道德认知、政治观点的过程,改变的过程也是说服和趋同的过程。语言在实际语境中的运用效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伟大实践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开创了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阶段,他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艺术问题的阐述、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修辞性运用等都是典范,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学习与研究。

## 一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过程也是话语创新过程,话语创新过程即对语言艺术性运用的过程,从修辞的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策略问题,有助于我们实现对于话语关注重点的转向,由“谁在说、说什么”转向“对谁说、如何说”,特别是“如何说”的问题。如果把思想政治

教育理解为说服的过程,那么修辞就是不留痕迹的说服。修辞是修辞者构思的产物,修辞话语是修辞者应用修辞技巧的结果。言辞对于心灵所产生的反应、效果如同药物对于身体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修辞作为一门“美言”的艺术,能够通过言辞操控人类的情感、态度和行为,使受众心甘情愿地接受某种观点、改变原有态度、实践或者摒弃某种行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用党的政策去教育、引导、调节、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sup>①</sup>。在这一点上,思想政治教育与修辞是相通的,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契合性。

### (一) 修辞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性

修辞(Rhetoric)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与语言的起源、发展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在古典修辞学看来修辞是“用文辞来影响人心的”<sup>②</sup>,具有“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sup>③</sup>。修辞话语作为人们对语言艺术性运用以及对语言应用效果追求的产物,它是人类在运用语言实践中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

收稿日期:2020-07-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KS183)

作者简介:刘先锐(1988—),男,安徽霍邱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思想咨询、思想政治教育修辞研究。

①杨静云:《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②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43页。

③亚理斯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提升言辞说服力和沟通效果的一种探索,旨在通过修辞性话语的运用打动和说服听者,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当代修辞学对于古典修辞学的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由“劝服”走向“认同”。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出现的修辞复兴开始,修辞理论的发展又进入一个高峰,涌现出一大批有见地的修辞学家,修辞理论也得到了深化。从尼采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修辞艺术的产物到哈贝马斯交流行动理论等,都是对于修辞的一种发展。美国修辞学家博克非常有见地地提出了自己的修辞“认同说”<sup>①</sup>。博克认为“认同”既是一种策略手段,又是修辞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修辞具有改变听者原本看法,使其认同言说者观点;改变听者原有态度,使其趋向言说者态度;改变听者原有行为,使其塑造符合预期行为这一基本功能<sup>②</sup>。修辞的基本功能是“人类施事者通过词语的使用促使其他人类施事者形成一定的态度或采取某种行动”<sup>③</sup>。修辞基本功能发挥过程也是修辞者组织、运用话语以改变受众的认知、看法、观念、态度乃至行为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修辞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应用话语体现理论说服力的学问,也是一门话语说事实践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具有使用语言进行交往,运用话语说事达到教育目的、提升效果的特性。”<sup>④</sup>修辞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的关联性,“说服”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目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党的生命线和中心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动员群众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主要目的,动员群众的过程也是说服群众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的过程,“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sup>⑤</sup>。“说服”是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工作,通过有效的说服,一方面大大增强了革命的有生力

量,“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sup>⑥</sup>。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也是运用言语进行说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语言运用的艺术性追求、对于修辞性话语的使用体现在老一辈革命家的言语实践中,这对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使用的言辞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勇气,增强了党和人民取得胜利的信心,为革命斗争提供了精神动力支持。修辞性话语在这一时期也迸发了巨大的言语力量。当我们有意识地、指示性地想使真理更有力时,需要借助修辞的力量,像“纸老虎”“星星之火”等修辞性话语,就取得了极好的话语表达效果,“彻底的理论本身并不表明已经说服了人,还需要有合理的述说方式才能折服人”<sup>⑦</sup>。修辞性话语与“彻底的理论”相结合,可以达到“折服人”的艺术化效果。如今,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为“趋同”,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受教育者对国家政策、方针的认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认同既是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策略,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在这一点上,与博克所提出的“认同修辞”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修辞作为一门研究概念与人的思想、感情、动机和行为之间关系的学问,它既可以作为一种条件,也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更可以当作一种行为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去。基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具有的认知同构性,我们可以通过修辞构筑起“概念——受众——说话者”这一情境中关系的有效性,即在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中,修辞具有“使观念适应人,使人适应观念”的功能,一方面有选择性地告诉受众感兴趣的东西,另一方面对相关概念进行更新,通过对于言辞的有效运用改变受众的观念和

①肯尼思·博克(Kenneth Burke)1897年出生于美国,被西方修辞学界认为是新修辞学的领袖,从20世纪末到80年代初,他通过《动机语法学》《动机修辞学》《宗教修辞学》《语言是象征的行动》等著作构建了自己的修辞理论体系,他主张“认同”应该取代“说服”成为当代修辞的中心概念,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认同修辞”,他考察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认同,即“同情认同、对立认同、误同”。

②博克认为修辞学基本功能是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基本功能的一个样态,即语言本身作为一种象征手段具有诱使天生敏感的人类个体相互合作的那个功能。

③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20页。

④李宁,李宪伦:《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学构想与探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年第8期。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⑦王习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教育对象“思想”深处着力》,《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3期。

态度,影响受众行为。

## (二)修辞性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在契合性

修辞性话语是人们在具体语境中,为达到说服、影响、认同目的而使用的一种带有修辞性质的话语。修辞通过言说和说服相结合,释放出巨大的言语力量,能够达到影响人类情感、改变人类态度、转变人类行为的效果。它通过获得受众理解,引发受众共鸣,最终获得受众的认同。言说和说服的结合体也就是修辞话语。人类对于话语进行修辞性雕饰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语言应用效果。作为言说艺术的修辞按照高尔吉亚的说法,具有征服一切的影响力,能够使言辞所及之人“心甘情愿而不是迫于无奈地臣服”,“演说是一位大权在握的王公,它能够通过最为细微精致的手段产生最为神妙的效果”<sup>①</sup>。修辞话语除了具有话语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即现实交流语境中运用的修辞话语具有说服力、趋同性、情景性特点。修辞话语所具有的这三种属性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内在的契合性。

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指在一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言说者和受众所使用的所有语言,包括了宣传话语、教育话语、疏导话语等;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指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语境中,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施教者用来沟通交流、劝勉说服、宣传灌输的一种具有教育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语言符号系统。首先,就说服力而言,修辞话语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都是作为语言的艺术性运用和对语言实际使用效果的追求,其在言语实践中被创造和运用的根本目的都在于说服听者接受自己的话语表达内容、观点、观念等。说服力与修辞的历史发展及其言说实践是同根同源的,诞生于希腊时期的修辞就是论辩的产物,而说服是论辩的根本目的。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实践中,毛泽东曾经说过:“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sup>②</sup>其次,修辞话语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都具有趋同性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过话语的交流互动,以期在某一方面达成共同认识,是针对某一事实、某一

观点、某一价值观念的“趋同”。受教育者原来所持有的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和由之外化的认识、情感、行为等,在修辞接触的过程中,教育者通过自己的言辞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期受教育者达到与教育者所持价值观念体系的“趋同”。再次,修辞话语具有情景性,修辞话语的情景性是指言说者创造修辞话语时具体环境所具有的特征,即修辞话语的情景、背景。“一个由人、事件、物体、关系及要求所组成的自然背景,这一背景强烈诱发言语的发生;这一被诱发的言语很自然地参与到这一情景中,在很多情况下是完成情景性行为所必需的,并且通过在情景中的参与获得了它的意义及修辞特性。”<sup>③</sup>同样,情景性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一个追求,言说者在使用修辞方法和修辞策略进行修辞话语创造时,其所处的环境具有特殊性,具体的修辞话语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某一具体的修辞形势或者修辞情景需要这一言语(即修辞话语),修辞话语是针对情景的反应而创设的,同时修辞话语也在情景中获得修辞意义。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要注意话语使用的情景和背景,“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sup>④</sup>。同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使用的话语更是这样。

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进行修辞研究,我们要认识到“辞而优则畅”的重要性,有效的修辞既有助于听者对于话语的理解和接受,也有助于话语的交流和传播,以“说服”为其产生根源的修辞对于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在教育过程中,既要诉诸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同样也要诉诸以言悦人、以势化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转换的导向与修辞话语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通过修辞助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说服力、感染力、传播力、渗透力,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乏许多鲜明的例证,毛泽东就是将修辞话语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典范。

①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3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页。

③肯尼斯·博克,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4页。

## 二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话语修辞分析

具体语境中运用的语言我们称之为话语,对话语分析必定是关于使用中语言的分析,修辞话语是话语的一种特殊形式。按照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sup>①</sup>的观点,主要关注三件事:“一是建构修辞性的话语所产生的背景;二是分析修辞性的话语本身;三是衡量修辞性话语在观众身上产生的影响。”<sup>②</sup>毛泽东所具有的卓越修辞能力、拥有的丰富修辞资源以及对于修辞策略的出色运用,对听者具有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学习。我们对“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sup>③</sup>这一著名论述进行修辞分析,旨在研究这一修辞性话语产生的背景、致效机制,以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启示。

### (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产生背景

修辞话语产生背景是指修辞者在创造和使用修辞话语时所面临的形势或语境。修辞话语产生的宏观背景是指修辞者所面临的形势,也叫历史背景。微观背景即修辞话语产生的语境,修辞语境包含了修辞者、场合、观众三个要素。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应当时谈话特殊的修辞情景需要,毛泽东进行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修辞发明,这一修辞发明产生了重大影响,言语中迸发出的力量足以震撼人心。

首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修辞话语产生的宏观背景。在国际形势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美帝国主义战略布局以及新的武器原子弹出现,这对世界其他国家都造成了直接影响。美帝国主义当时对于中国的战略是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在军事上、经济上、国际政治上都给予了蒋介石巨大的援助。就“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辞话语产生的国内背景而言,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

党在重庆经过43天谈判所签署的《双十协定》在国民党内战准备完成之后被撕毁,国民党在1946年6月开始进攻中原解放区。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共两党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战略区域上都存在巨大差距,许多人对于共产党能否打败国民党、守住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存在很大的顾虑和怀疑的宏观背景下,“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修辞话语产生了。

其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产生的微观背景。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作为采访对象的毛泽东<sup>④</sup>、“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发表的场合、该修辞话语的致辞对象。第一,作为采访对象的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这种特殊的身份对毛泽东的说话方式、语气、风格等都会造成影响,针对特殊时期的局势,在面对国外记者采访时,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坚决、果敢等是进行这一修辞话语表达的前提。第二,从该修辞话语发表的场合来看,是在美帝国主义从军事、经济等方面支持国民党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国共两党实力悬殊的宏观背景下,作为此次采访人的斯特朗对于共产党能否取得最终胜利心存疑虑,进而与毛泽东展开了以此为主题的采访。毛泽东在回答斯特朗关于美国使用原子弹进行反苏战争的提问时,使用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sup>⑤</sup>修辞性话语进行回答,而后又进一步表达成“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三,就该修辞话语的对象而言,直接受众是以记者身份出现的斯特朗。当时作为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的斯特朗,从1925年开始进行了多次访华,斯特朗对中国共产党是友好的,对于中国的国情也是比较了解的,对国共关系、国共实力以及战争战略局势也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毛泽东在采访过程中用“反动派”“纸老虎”等修辞表述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该修辞性话语的潜在受众是美国社会和美国人民。采访中,斯特朗问道:“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

<sup>①</sup>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理论遵循亚里士多德“在每一件事上运用可以规劝的能力”,主张将修辞话语置于言说者、场合、受众三个广阔的背景中,倡导从修辞者的理念、情感和人格方面出发,对于实际语境中使用的修辞话语,从构思、组织、记忆、风格和发表五个方面进行考察。

<sup>②</sup>大卫·宁,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常昌富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sup>③</sup>《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页。

<sup>④</sup>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作为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从1925年起多次访华,1946年6月是她的第五次中国之行,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她。由于斯特朗的记者身份,我们可以将这次会谈理解为一个采访。

<sup>⑤</sup>《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页。

怎样回答呢?”<sup>①</sup>

## (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修辞意蕴

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修辞发明,至今仍然作为一个典故和习语经常被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人针对特定言说主题加以引用和借用,具有历久弥新的特质。毛泽东针对当时具体修辞情境所进行的这一修辞发明具有长盛不衰的修辞魅力。

首先,我们从总体上对这一修辞发明进行分析,修辞发明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根据具体修辞形势、修辞目的、修辞任务进行修辞构思和立意,寻找、发现、创造和初步组织可说、该说、值得说的话(修辞性话语)的过程。“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具有“外松内紧”的修辞结构,这一结构具有很强的修辞力度和修辞隐形度,其所用到的修辞格是复杂的。我们对该修辞性论述的辞格分析不难发现:虽然辞格复杂,但是听者一点都不会觉得造作、晦涩、生硬,这与该修辞性表达所具有的形象性、情景性、想象性、情感性等特征是分不开的。此外,这一修辞性表达对于听者来说,是可感可知的,达到了本体和喻体的和谐统一,听者在对这一修辞语言进行理解时,依据自己的想象、类比、推理可以很好地完成“言——思——意”的转换。毛泽东在进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修辞创新中,遵循旧中有新、新旧并存的原则,是陈俗与新颖的统一。这种统一体现在熟悉与陌生的张力中,“看上去总是既熟悉(基本格式不变,喻体必须是受众熟悉的事物)又陌生(喻旨必然偏离常规,转义辞格中发生的语义变化)”<sup>②</sup>。这种旧中有新、借旧布新主要体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老虎、老虎——纸老虎、反动派——纸老虎、国民党——纸老虎”的转义辞格的语义变化中。通过这种转义辞格运用达到改变斯特朗、美国民众以及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人对于国民党军事力量强大、国共力量悬殊的原有认识、观点和态度。毛泽东为了实现修辞目的,在修辞策略和手段运用上,他借助受众原有的、觉得理所当然的既存认识、事实、判断、观念等对其进行说服;依托于受众“前理解”所构筑的修辞话语,以及受众感到亲切自然、易于接受的修辞话语,实现

自己的修辞目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借助受众对于“老虎”“纸老虎”的“前理解”,完成了对反动派是纸老虎并不可怕的理解。

其次,从辞格分析上来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修辞话语辞格高度浓缩,是不同辞格叠加使用的产物。在一个只有10个汉字组成的句子中,毛泽东运用了物体化、隐喻、反喻、强调、层进、重复等辞格。在构筑这一修辞表达时,毛泽东首先使用一个排比和隐喻进行组合,将“国民党”分别比做两个不同层次的同义喻体,即“反动派”“纸老虎”。“反动”原意是物理上的反方向运动,在这里特指逆历史潮流、反历史发展、反对进步。毛泽东用“反动派”反喻“国民党”,从共产党的立场来看,国民党是反对进步和发展、反对正义和革命的派别团体。使用“派”而非“党”,即没有使用“反动党”的表述,在修辞表达上磨灭了其合法性,“反动派”这一指代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非常具有象征意义。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隐喻通过将充当喻体的抽象概念巧妙地当作实实在在的事物,即“老虎”和“纸老虎”,在“国民党——反动派——老虎——纸老虎”这一构造中,将“本体(国民党)——是(像)——喻体(纸老虎)——相似点(看似可怕,实则虚张声势)”完成了统一,对听者具有认知导向价值。这一修辞手段——比喻,是沟通具体和抽象、国民党和纸老虎的中介和桥梁,“纸老虎”作为一种换喻表达,用“老虎”指代凶残,“纸”指代柔软、轻薄,“纸老虎”指代没有强大力量、不足为惧,通过建立“反动”和“纸”之间的联系进行感官化转换。反动的事物是逆历史发展规律的事物,是没有生机希望的事物,因而也是没有力量的事物。毛泽东用“纸”这一物体化(reification)辞格,将反动的力量呈现出来,变成可感可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在不知不觉之中使它们的功能由喻体转化为本体,从而在事实上构筑了另外一个层次的两个换喻。这两个具有更加隐匿性的比喻最后再通过一个叠加的“套盒”隐喻以层进的方式串联起来,构成了关于“国民党”的一个总隐喻。

再次,毛泽东使用“一切”“都是”两个感情浓烈、具有强调意蕴和刺激性的语词,可以很好地触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页。

<sup>②</sup>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52页。

动和震撼听者的心灵,迸发出巨大的言语力量。同样,在对喻词的使用上,毛泽东用了“是”而非“像”,没有表达成“一切反动派就像纸老虎”。连接词“是”的使用大大积蓄了该修辞表达中蕴藏的巨大话语力量,对听者的心灵施加了重要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强大的思想观念,同时也打消了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怀疑、疑虑。这一修辞话语成功地开发和释放出言语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对国内外听众的原有观念形成了巨大冲击。总体而言,毛泽东针对当时具体的修辞形势,即言谈中的争议点<sup>①</sup>进行了修辞发明,斯特朗和潜在受众认为国民党在各种资源方面占尽上风,是名副其实的“老虎”,而毛泽东在认定国民党为“反动派”的前提基础上,又针对“老虎”这一形象,创造出“纸老虎”这一修辞话语,达到了很好的话语表达效果。在句子表述上,对于受众而言,这一祈使句在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完成了“弱势祈使——中性祈使——强势祈使”的转变,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具体到当时的修辞情景,毛泽东从情、理、言三个方面对斯特朗进行了说服。

### (三)“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修辞效果

人们在现实语境中使用的话语都服务于特定目的——说者想在听者心中或者身上产生效果,这种效果按照人类的心智功能可以分为启发受众的理解、丰富受众的想象、触动受众的情感、影响受众的意志四个层次。对修辞性话语在受众身上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归根结底,就是要对“言”和“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即修辞性话语在达到影响、说服、趋同目的时所发挥的力量,这种力量既是对言说技术的运用,也是对言说效果的追求。修辞性话语对受众“心”和“身”(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能够产生影响,从对“心”所产生的影响来说,修辞者改变了听者的观点、看法、态度等;从对“身”所产生的影响来说,修辞者引发符合其预期的行为在听者身上出现。对“一切反

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修辞话语效果进行分析,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即该修辞表达在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效果、在国内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效果以及对修辞话语的直接受众——斯特朗所产生的影响效果。

首先,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效果而言,Paper-Tiger 是毛泽东创造的、被西方社会所熟知的一个单词。在谈话过程中,英语对于这一句话的翻译是(All the reactionaries are the Paper-tiger),翻译想用英语中类似的比喻稻草人(Scarecrow)来代替“纸老虎”,因为英语本身没有这个单词,后来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 Paper-Tiger。”Paper-Tiger 这个组合词成为与列宁“泥足巨人”相类似的表达在世界广为流传。毛泽东所发明的这个带有修辞性质的英语单词令西方社会印象深刻。后来西方政客恭维毛泽东的英语水平,毛泽东说我就知道几个单词,例如,tiger(老虎),paper(纸),背后所内含的丰富内容只能让西方政客苦笑。这一修辞话语对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效果来说,它清晰地传达出“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sup>②</sup>这一根本思想,是毛泽东“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深刻阐述,也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不惧怕反动派居于表面的、暂时的力量,对于取得最终胜利具有坚定的决心和信心。这一修辞话语使西方受众感到震撼、感到可信在理,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其次,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国内社会产生的影响效果来说,这一修辞性话语最初是作为回答斯特朗的提问而在具体语境中使用的言语,进而由于其卓越的穿透力、传播力、影响力发展成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著名口号<sup>③</sup>,后经毛泽东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这一修辞话语

<sup>①</sup>争议点即言说者和受众在意见和看法上存在的根本分歧,有争议的地方;在具体修辞情境中,言说者要明确争议点,而后针对争议点进行修辞发明,选择说服手段。

<sup>②</sup>《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sup>③</sup>“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的一段话。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口号。北京市委党校党建研究所的杨德山选择了其中的80句口号并做了背景介绍,“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是其中口号之一。

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口号式的修辞话语表述在当时广为传播,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产生了巨大力量,打消了許多人对于取得最终胜利而存在的顾虑和担心,从而从心理上极大地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勇气和必将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从理论上来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修辞性表达,它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内含了毛泽东丰富的战略战术思想。

再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对受众斯特朗的影响效果。这一修辞性话语既是毛泽东对斯特朗提问的回答,也是他们进行此次采访的主题和中心。在这次采访过程中,毛泽东对“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进行了全面的论证。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正面“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

料的强大得多”<sup>①</sup>进行了论证;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都被历史证明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对这一谈话中心点进行了具体论述,通过诉诸道理、诉诸情感和诉诸言辞,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斯特朗原有的看法、观点,打消了她对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战争中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疑虑和顾虑。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是对列宁“泥足巨人”的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很多对于修辞性话语运用的鲜活例证,例如,马克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sup>②</sup>、毛泽东的“桥”和“船”、邓小平的“黑猫”和“白猫”、习近平的“滴灌”“扣扣子”“中国梦”等,对于今天从修辞的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策略和效果,构建受教育者注意听、听得进、有好感的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 The Rhe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Discourse “All Reactionaries Are Paper-tigers”

LIU Xian-rui & WANG Xi-sh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not only to the issues of “who says”, “what to say”, and “to whom”, but also to the issue of “how to say”. “To carry one’s point, one must persuade”. Strategy and method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guidance of rhetoric theory. Mao Zedong’s political discourse “all reactionaries are paper-tigers” is a paragon of rhetoric. Rhetoric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is discourse will help us accurately reveal, deeply understand and correctly grasp the rhetorical law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and then build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to listening, a system of discourse that can be heard and favored, thereby enhancing the persuasiveness, appeal, and commun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Key words:** Mao Zedong; political dis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hetoric; figures of speech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